

第一编

战略防御阶段的作战(1937.7—1938.10)

抗日战争图书网
www.krzzjh.com

第一章

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第一节 日本全面侵华，国共合作抗战

一、日军肇事，制造“卢沟桥事变”

北平卢沟桥。1937年夏天，华北平原赤日炎炎，暑气蒸腾大地，干燥闷热，令人难以忍受，仿佛一粒火星便能引发一场熊熊大火。

入夏以来，在日本东京盛传“不久在华北要发生什么事”；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私下间流传着这样一条小道消息：“七七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一切迹象表明日军将阴谋发动侵华战争。

日军驻屯军在北平郊区频繁举行实战演习，愈演愈烈，明目张胆地向中国挑衅，使当地驻军官兵早已憋了一肚子火，中日两国的军队彼此虎视眈眈。烈日下，日军三八式大枪上闪闪耀眼的刺刀，与第29军大刀片上明晃晃的反光互相刺激着，战争爆发的焦点在迅速聚集，随时随地都可以点燃战争的火星。

驻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部队是宋哲元第29军所部。

第29军原为西北军老底子，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下野，该部被改编为



背着大刀守卫卢沟桥的第29军士兵

第29军。此时共辖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又及1个特务旅和2个保安旅，每个师有4个旅，总兵力10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军部驻北平南苑。第37师师部在西苑，第110旅驻防西苑、八宝

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

第37师第110旅旅长为何基沔。该部是一支在喜峰口以大刀让日军丧胆的劲旅，也是一支以“大刀进行曲”闻名全国的部队，如果说第29军是把大刀，那么第110旅就是横在



第29军的大刀曾使日军丧胆落魄

卢沟桥头的一支利剑，随时都可以给来犯的日军以致命一击。

7月6日，日军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城去长辛店演习。驻军不允许日军通过其防地，双方对峙上了，谁也不让，相持了十多个小时，到天黑日军才退去。

面对日军的演习挑衅，旅长何基沔叮嘱部队：“小鬼子搞演习，来者不善。咱们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要时刻提防着他们，不要忘了喜峰口砍杀鬼子的传统，关键时刻再让他们重新尝尝大刀的滋味！”

7月7日这一天，日军驻丰台的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指挥下，在卢沟桥北永定河东岸的回龙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与以往不同的是，该部枪炮皆配备了充足的弹药，看样子是有备而来，要动真格的了。

旅长何基沔立即打电话给正在保定的师长冯治安，冯立即赶回北平，与何基沔商议对策，布置好部队以应对突发事变。

是夜10点30分左右，万籁俱静，只有河边不时响起几声蛙鸣。

宛平城的中国士兵进入梦乡，这时西南方向响起几声清脆的枪声，在深夜中显得诡秘和恐惧。

深夜11点左右，一队全副武装的日军来到城门紧闭的宛平县城下，向城上的守军命令“开城”，说有一名日方演习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检查”。

守城卫兵不敢怠慢，急忙报告给营长金振中，金不敢擅自做主，便又报告团长吉星文。吉星文是西北军名将吉鸿昌的侄子，一个脾气暴躁的河南汉子，一听说血往上涌：

“狗日的小鬼子欺人欺上门来了，爷们儿城门是紧闭的，哪有狗杂种钻进来？明明是来找事的。让弟兄们赶紧起床，子弹上膛，手榴弹挂足，来硬的就和他们干！”双方相持不下。

当时，日本驻屯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正在秦皇岛检阅步兵第2联队，其职务由日军第1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代理。牟田在接到报告后，命令第3大队一木大队长立即率主力前往现场，占领要点，并与驻宛平驻军进行交涉。

深夜12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冀察外交委员会，要求派兵入宛平城进行搜查，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外交委员会将松井电话内容报告了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秦德纯当即命令驻宛平部队和河北省第4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真相，以便处理。王随即通知金振中，经过调查，城中并未有开枪事件，也没有失踪日兵踪影。王冷斋将事实汇报，为避免扩大事端，王冷斋奉命与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等与松井太久郎谈判，双方商定，中日两方派员进城调查，再做处理办法。

此时，所谓失踪的士兵已经找到，一木大队长拨通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电话，无中生有地报告：“中国军队再次向我方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回击？”

牟田回答：“被敌攻击，当然要回击！”

一木又追问道：“那么，开枪射击也没有关系吗？”

“是的！”牟田的回答简单明了。

后来，在1944年，牟田已升任驻缅甸第15军中将司令官，在回忆往事时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①

正当中日双方人员于8日凌晨4时到达宛平县署，与县长王冷斋进行交涉时，东门外突然炮声大作，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炸毁了营指挥部。顷刻间，西门外大炮、机枪响成一片，日军开始攻城了。

第29军部立即下达命令，命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并有“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等语。

^① [日] 小侯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太平洋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第181页。



负责守卫卢沟桥的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



担任守卫宛平卢沟桥任务的第110旅第219团团团长吉星文，该团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旅长何基沣也向团长吉星文下命令：“对进攻的日军，立即还击，坚守阵地，我马上派部队支援你们！”

日军炮击过后，步兵蜂拥而上，当接近城垣300米时，守军枪声齐射，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日军伤亡颇重。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自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双方每次冲突不论其偶然性多少，都是日军制造，并发展成日军进攻的必然，都成为日本侵华的借口。

随便都可举出日本制造事变的案例：

1931年11月初，日军唆使汉奸李际春、张璧等组织便衣在天津暴乱，制造了天津事件。

1932年1月28日，日本特务机关制造了日僧在上海被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上海的军事进攻，战事长达两月之久。

同年在东三省制造了怪胎“满洲国”，扶植了一个伪满傀儡政权。

1933年1月1日，日军发动了对山海关的进攻，夺取了重镇军事要地山海关。

2月，日本关东军进攻热河，占领了该省。

3月，日军向冀东长城各口进攻，并占领了冀东。

1934年6月8日，日本借口驻南京副领事藏本失踪，企图制造事变。4天后藏在明孝陵附近的藏本饥渴难忍，主动走出，日本失去口实而未爆发事变。

1935年1月，日本制造了察东事件。

5月，日军制造了热河事件。

9月，日本特务挑唆汉奸制造香河自治运动。

12月，日本制造冀察两省特殊化事件。

1936年1月，演习的日军制造了朝阳门事件。

5月，在天津制造了“大沽冲突事件”和“金刚桥事件”。

同月在北京丰台，日军挑起事端，强迫第29军让防，9月，丰台日军又制造事端，第29军被迫让出营房。

10月26日至11月4日，华北驻屯军举行“秋季大演习”，日军以北平为假想进攻目标，以卢沟桥、宛平城为重要攻击点。参加部队近万人，演习范围达4万平方公里。北平近郊和天津等地的重要地区都有日军的铁蹄的踪迹。

日军步步紧逼，每次制造事端都占尽了便宜，中国不是割地就是赔礼。华北没有一块安宁的地方，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如果说1936年以前是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那么进入1937年，日本张开了大口，开始了对中国的鲸吞。是年的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放出“中日提携”的烟幕下，紧张地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

2月20日，外务省制订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

4月中旬，日本政府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4相会议，密谋侵占华北。

6月4日，新上任的首相近卫文麿，在其内阁中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正、外相广田弘毅、藏相马场英一等都是军部中的“革新派”，且掌握了内阁中的实权。“扩大派很快占了上风”。

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部存在分歧，由此分成“不扩大派”和“扩大派”。

“不扩大派”主要代表人物为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和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等人。他们认为，目前不是扩大战争，而是巩固在中国的侵略成果，不失时机地开发满洲，利用中国的资源兴建大工业。待到积存有战费50亿日元，能动员15个师团，同时能动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一半时，再利用半年的时间，把作战地域扩展到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如果现在就扩大战争，中国会举国一致发挥较强的力量，日本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因此，他们主张“此刻宜慎重从事，不可陷于武力纷争”。

“扩大派”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和参谋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人为代表，人数较多，他们大都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活动，在侵略中国时立过功。他们认为中国的当权者都患有恐日病，“确信对中国只需拔刀威胁一下，它就会屈服”。他们扬言：只要日本造成动员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

会投降。另一部分人似乎还留点余地，断言“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完事大吉了”。

日本内阁的战争叫嚣不是偶然的，是和当时日本国内的战争气氛相关联的。当时在日本国内，侵略战争的空气甚嚣尘上，在东京，歌舞剧院在上演歌颂复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电影院则大肆放映以1932年进攻上海为内容的电影《炸弹三勇士》。日本军方为了表彰这三个侵华“英雄”，特提其升两级并授予金鸡奖章，同时为其举行了街村葬礼，为他们树立了铜像和纪念碑，不遗余力地煽动军国主义侵华狂热。

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指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的中国局势，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6月27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了临时作战课。

自6月以来，驻丰台一带的日军不分昼夜地举行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的军事演习。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指挥官和大部分幕僚，猬集在宛平城东的沙冈，对演习日军进行现场指导，并派遣部分辅佐官对丰台、宛平卢沟桥进行勘察。

一时间，平津战争气氛恐怖弥漫，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白天不敢下田耕作，田地荒芜。晚上早早关门熄灯，屏气忍愤。点灯人家也要用棉被将窗户堵上，唯恐遭到不测。

由于日军连日演习，“密迩京师，八方通衢”的卢沟桥也变成了商旅不行、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桥东“卢沟晓月”的御碑巍然屹立。御碑下，手持钢枪、身背大刀的第29军战士站岗，警惕地守卫着卢沟桥。长年在中国从事记者采访与学术研究的美籍学者拉铁摩尔，以他对日本侵略性的研究与记者的敏感，曾这样描绘平津的局势：“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另一个九一八呢！”^①拉铁摩尔指出，大家都应当记得以前日本一个短短的自由派运动的插曲和同样过分热烈的对华友谊的表示，曾经成为对满洲突然进攻的导火线。在这种年头里，没有人能否认国际间应当遵守诚意的礼节，日本的外交却总是把凶鸷之鹰与和平之鸽交换着导演着的。^②不在平静中爆发，就在平静中死亡。当时的局势果然被拉铁摩尔言中，日本又上演一次九一八事变，在卢沟桥肇事了。

^① 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编：《冀察热人民抗日斗争参考资料》，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② 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编：《冀察热人民抗日斗争参考资料》，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日军军官在卢沟桥畔策划肇事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即使没有卢沟桥事变，还会出现其他什么事件，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个不争的事实，先是东北，现在是华北，只要有一颗火星就能点爆这个巨大的火药桶。

二、中国守军奋起，誓死保卫卢沟桥

7月8日凌晨。中国代表、宛平县县长王冷斋面对日军的无理纠缠、挑衅、威胁、武力恫吓，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据理力争，全副武装的日军代表在他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

日军见交涉、威胁无效，于5时30分向宛平城的中国守军进行炮击，继而向卢沟桥、龙王庙和铁路桥东头发起了进攻。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29军的将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发表声明：“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竭力周旋。”同时，第29军向防卫卢沟桥部队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旅长何基沣根据军部命令又向守桥部队下达了三条命令：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日军3大队主力在大队长一木青直的率领下排成4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龙王庙和铁路桥中国守军扑去，扬言要在中国军队驻地搜寻“失踪士兵”。中日双方在龙王庙附近遭遇，守军排长申仲明站在桥头，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早已准备，突然开枪射击，申排长壮烈殉国。

申排长的牺牲激怒了第29军的战士，为保卫祖国领土，捍卫民族尊严，他们奋起反击自卫，守军两个排的战士，面对900名日军毫无惧色，几十支枪喷射出复仇的怒火。当敌人冲上阵地上后，战士们又抡起大刀，冲入敌群，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14分钟后，终因敌众我寡，两个排的战士几乎全部战死在铁路桥头阵地上。

上午，日军进攻卢沟桥铁桥，桥上有一个连的守军防守，双方为争夺铁桥，打得激烈异常。日军曾一度将铁桥南端占领，中国军队死守桥北，与日军对战。

日军以死亡上百名士兵的代价，占领了龙王庙和铁路桥东头。

牟田率部占领永定河以东，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命令：由天津经通州到北京的部队由其指挥，增援部队为：步兵第1联队第2大队、战车1个中队、炮兵第2大队、工兵1个小队。

天津。7时30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对驻天津的各部队下达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命令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河边正三旅团长马上返回北平，决心扩大战争。

牟田接到驻屯军命令，即于9时25分命令副联队长森田指挥一个大队兵临宛平城下，进行武力威胁，要求中国守军退到永定河西，如果需要，即占领卢沟桥。森田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守军的严厉拒绝。森田见威胁不成，便令部队攻打宛平，守军用猛烈的射击，表明了与宛平城共存亡的决心。

13时，牟田从北平到达宛平城东北的沙冈前线，亲自指挥作战。15时30分，河边正三旅团长也赶到丰台督战。但此时日军在丰台地区兵力相对较少，河边正三一面命令第三大队在龙王庙附近，在已占领铁路部队的掩护下渡过永定河，一面以谈判为幌子等待援军，待援军到达后再于9日进攻宛平城。

8日晚，几天来阴暗闷热的天气，酿成了一场大雨。入夜，细雨蒙蒙，夜幕笼罩的战场一片沉寂，大雨过后的高粱、玉米叶子挺拔、绿得发亮，像千万把挺立的钢刀，使浓密的青纱帐显得神秘、深不可测。

就在这时，由吉星文团青年战士组成的突击队，用绳梯缒出宛平城，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永定河堤向铁路桥靠近。连日来，日寇蛮横的侵略行径，使战士们达到了极度的悲愤，他们简直要发疯了，如若再不要他们冲出城去



指挥军队进犯卢沟桥的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

两边狼奔豕突，东奔西逃，逃不走的就跪地求饶，一扫过去那不可一世的皇军神态。一位年仅19岁的突击队员，竟手刃日军13人，生擒1人。突击队硬是用手中的大刀，将日军一个中队全部砍杀在铁路桥上。这次作

战突击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近四分之三。

事后，一位突击队的伤兵回忆当时的战斗场面说：“弟兄们将敌军打败后，还拼命地追杀过去，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集合回来，结果，还是官长亲自把他们叫回来的。因为我们有命令，只能死守，不准进攻。但这情形好像猎犬追赶兔子一样，是一个无法抑制的行为。”

日本进攻卢沟桥，全面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向全国疾呼：

刺杀日本兵，他们简直要自杀了。出城杀敌的命令一发出，有的战士竟等不得用绳梯，便飞跃下城，恨不得把日本兵一扫而光。

夜12时许。

大雨过后，永定河波涛滚滚，向东南方向流去，蛙声响成一片。占领铁路桥和龙王庙的日军，有的随地而卧，有的抱枪瞌睡，他们在梦想着天亮换防休息，或继续向永定河西发起进攻。

突然，吉星文率突击队如神兵天降，大刀闪着寒光，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有的还未清醒，就身首异处，有的还在作抵抗，猝不及防便成了刀下鬼。日军在铁路



第29军部队紧急出动，抗击日军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请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通电号召，“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①

同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为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侵犯华北致电蒋介石：“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第29军，奋起抵抗，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志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②

同时，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等，高度称赞其“处国防最前线，不畏强暴，奋勇抵抗，忠勇壮烈”，并表示“誓为贵军后盾”。

9日凌晨，第29军从长辛店调来部队，协同我桥北守军向南端日军予以夹击。

是夜，天上飘着细雨，擅长夜战的第29军持步枪、手榴弹、大刀，秘密摸爬进入桥南端，一顿手榴弹将日军炸得晕头转向，紧接着大刀队的大刀上下纷飞，刀光闪处，日军身首异处，未死的日军纷纷向后狂逃，中国军队胜利收复铁桥。

日军见情况不利，派员与中方洽谈，认为事出误会，希望停战会商。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派人与北平市长秦德纯会谈，要求双方立即停战，撤回原防，并由双方组织视察团监视双方撤兵情形。松井要求撤换吉星文团，改由石友三保安队驻守。

日军此举不过是其缓兵之计，其时正调动大军增援平津。收复铁路桥后，第29军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对宛平城的威胁。尤其是第29军官兵不负国人厚望，予进犯日军以重创，民心因之兴奋，军人为之振奋。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66年7月版，第315-316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1页。

第二节 国民党的抗战准备

一、蒋介石抗战思想演变

7月8日，江西庐山，国民政府的夏都。每年夏季，为避南京火炉的盛暑溽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都搬到庐山办公。

上午10时，侍从参谋送来了常驻北平的军政部参事严宽向部长何应钦的报告：“昨夜日军强迫侵入卢沟桥镇，遂与我驻卢部队发生冲突”。并报告了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的看法：“日军示威多日，此次在卢发生冲突，系日军有计划行动：我军士气极盛”。^①几乎在此同时，外交部也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

蒋介石听到报告，感到事发突然，他曾预料日军在华北迟早要肇事，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事变既已发生，他认识到此事非同寻常。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六项承诺，嗣后又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内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也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报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等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等就两党合作抗日的事进行谈判，这表明国内内战已经结束。

内战结束，使得蒋介石专心考虑抗日的问题，但他又被上半年日本派来的这个访问团、那个考察团所迷惑。虽然平津方面不时报告日军进行演习的消息，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在有关的场合提醒他要对日本提高警惕，周恩来甚至当着蒋介石的面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现在“卢沟桥事变”既已发生，蒋介石深知该地区战略价值。他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召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军委会所属有关部负责人来海慧寺商量。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到重庆主持川军整编，军政部部长由俞飞鹏代理。同时，蒋介石要求外交部摸清日方的动向企图，以及各国对此事的反应，令军委会第二厅认真搜集事变后日方的情报，并注意国内各方，特别是共产党方面对此事的反应。蒋介石希望这一事件能像以往的危机那样得到化解，他怀着忐忑不安

^① 《严宽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8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78-179页。

的心情度过了这一天。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步步紧逼，难道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能坐视不管而让日本随意蚕食鲸吞大好河山吗？回答是否定的。

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侵略，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意识到国难临头。尤其是民国以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炎黄子孙都看清了这样一个趋势：整个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势必爆发。何况华夏民族自古的“夷夏之辨”思想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埋藏在他们的心底，一旦强敌入侵，随时都会萌生抵抗的激情。作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蒋介石，概莫能外。

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兵锋所向，北洋余孽无不土崩瓦解，正当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进入山东境内之际，日本出兵青岛、济南，恣意挑衅，酿成济南“五·三”惨案。蒋介石用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时，日军却惨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凌辱、软禁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黄郛，日本兽军的种种劣行，令人发指。

“济南事件”是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最早与日军接触，并遭到重大损失而不还手的一次屈辱的事件，作为当事人的蒋介石表面上忍气吞声、退避三舍、息事宁人，但内心世界的挣扎与斗争，为日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是蒋介石最初萌生复仇抗日思想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

“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①

不久，复仇之誓又出现在蒋介石日记中：

“如有一毫人心，岂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也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为人所不能忍耳。”

从此后，蒋介石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决心，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张作霖逃往关外，在沈阳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南北划一。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感慨万千，曾痛心疾首地说：“今年五月，济南事件，全国

^① 蒋介石日记现暂存于美国胡佛档案馆，国内史学界同仁赴美抄阅。以下引用均为抄件。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皆认为空前之国耻。然余等在前线亲历之耻辱，更非国人所能想象于万一。明知种种挑衅举动，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相容之确证，却又不能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我国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天下事，间接感受者，总不如亲历其境者为刺心骨。果使任何同志亲历余之境遇，余知必与余怀有同一之感想。”

之后，蒋介石又坠入与新军阀混战和“剿共”战争，无暇顾及日本。

1931年，正当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对红军的“围剿”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

但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是“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

南京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蒋介石决定采取诉诸国联，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他认为日军在关外的动作与红军在江西腹地的割据相比，前者为肢体之患，而后者则为

心腹大患。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武装。他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法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绝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这种观点无疑是荒谬的，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侵略战火离首都南京咫尺之遥，已经严重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之时，第19路军当即奋勇还击，全国人民抗日决心又一次掀起高潮，与红军的存在相比，一则尚在湘赣鄂边区，一则就在眼前，蒋介石立即通电：“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之人，宁能再忍！我19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体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一·二八事变是蒋介石化抗日思想为具体行动的一次实践。他除了紧急调派精锐第5军增援淞沪外，又制订了《全国防御计划》，将全国划为五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防卫区为江苏南部及浙闽；第四防卫区为广东广西；第五防卫区即四川。很明显，防卫区的划分是针对抵抗日本的进攻而制订的，已有日后抗战战区划分之雏形。此外，他还将国民政府立即迁往洛阳，他认为：“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①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现场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87军事档案。

与此同时，蒋介石仍将调停的希望放在国际联盟处。1932年3月17日，国联大会决定：1. 凡违反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所取得之地位、条约及协定，国联会员国均不承认；2. 任何一方使用武力压迫，免取中日争执之解决，均与国联精神相违背；3. 设置十九国委员会，代表大会处理本案，并向大会报告。

在国联斡旋下，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在外交上又作了一次屈辱的让步。他随即施行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4次“围剿”计划，并重申：“我们这次剿匪戡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他反复告诫部下：“希望大家共同一致，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中日最终不免一战确信无疑。1933年初，他说：“倭寇攻热（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出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

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的教训，亦使他清楚认识到，如果抗战开始，南京是无法保得住的，但洛阳也非根据地；然而抗日的基地将建在何方，他未有明确的目标。他设想或巩固中原，或退到边区，但必须有根据地，“以为将来恢复之基”。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

果然，1932年7月，日关东军从锦州向热河进攻，至1933年3月，热河全境失陷。国民政府虽然制订了《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调兵遣将，但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对红军的“围剿”上面，而且动用的兵力越来越大，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同年5月17日，日军前锋抵北平市郊，向中国提出停战条件：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5月31日，中国代表屈辱地在《塘沽协定》上签了字。日军兵临华

北，一边是耀武扬威，剑拔弩张；一边是忍气吞声，处处退让。在此背后，便是蒋介石刻骨铭心的仇恨，他说：

“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

二、国民党的备战举措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动，蒋介石一面在“剿共”的同时，一面也在暗中准备抗日的部署，总的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目的地将重工业向内地转移，避免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全国大工厂、铁路的建设也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相结合，由政府审定其建设地点。

第二，完成铁路向西向内地之干线建设，例如完成陇海铁路西段、沪杭甬铁路、钱塘江大桥、整理浙赣铁路都是以备战为目的建设的。此外，计划中的京赣铁路、湘黔铁路等都是为抗战后向大后方转移而准备的。

第三，在经济区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主要针对日本）威胁的地区设立“国防中心区”，当时被确认的中心区城市主要有五处，即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

第四，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着重进行国防经济资源的调查，筹划战时军事、经济动员和国防重工业设计计划，开发国防资源，以备战时国防需要。

第五，施行法币政策，进行币制改革，统一了混乱的货币，不但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并为日后的长期抗战，奠定了财政经济基础。因此，日本人评论说：“如无1935年之法币，则无1937年之抗战。”

第六，整军肃武，大力发展海、空军建设，重提航空救国的口号。并大力发展军事教育，暗中构筑国防工事。

第七，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方法，唤起国人现代觉悟与意识，提高人民的觉悟。

第八，坚持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政策，加紧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10月，瑞金的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向湘、黔、滇、川等省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5年，蒋介石的中央军以“追剿”红军为名，一石二鸟，进入被地方军阀控制多年的贵州、云南、四川等省，打破了西南军阀割据的封建局面。蒋介石到了天府之国后，立即被四川地势的险峻、复杂所折服，决心以四川

为抗日战争持久战之根据地。后来他以炫耀的口气说：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绝不能漫无计划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

1935年初夏，“华北事变”发生，日军逼迫中央军撤出华北，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市党部；调走军委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及宪兵第3团；禁止全国排日行动。日本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要求完全控制华北。蒋介石未必认识不到日本的图谋，但因顽固坚持反共为先的反动方针，对日本侵略者一直采取忍让政策，此时他电告何应钦：“言牺牲尤当知委曲求全之必要。此时之委曲忍让，决非苟求幸全，盖未至最后关头耳。”

可以认为：1935年，是蒋介石酝酿持久抗日思想关键的一年。之所以这样讲，有以下因素不容忽视：

第一，蒋介石的“安内”行动已基本完成，红军已从江西根据地退出，在长征中主力从8万人损失至3万人，偏陕北一隅，由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已变成肘腋之患。

第二，蒋介石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中央整理川事亦见成效，蒋介石已选中四川为持久抗战之根据地。

第三，日本的侵略步步加剧，自东北落入其势力范围后，日军在华北频繁挑衅，妄图造成华北独立的事实日益显现，如再任其发展，华中亦将不保，最终威胁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即使日本不对其构成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权亦将失去民心而垮台，为了生存，蒋介石决心抗战。

第四，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并加紧陆军整顿，此举并不完全针对活动在湘桂黔滇川陕边界的几万红军，针对日本的备战已很明显，尤其是修筑以南京为中心的国防工事。至抗战爆发前，已完成江浙区及鲁南、鲁东、鲁北阵地，江防海防要塞的整備亦次第完成。

第五，新生活运动的提倡和法币改革，从思想上与财政上为抗战奠定了最后心理与经济的基础。因此，日本首相阿部信行指出：“中国有三个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整理财政、整理军备和新生活运动。”他将此三件事列为抗日战争的必要准备。^①

然而，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否是和平已经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他还无法断定，因为他对日军制造事变的意图还不明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他似乎还心存幻想，还不愿付诸抗日的行动。

是日下午，外交部次长陈介约见日本使馆副武官大城户三治，向日方提出口头抗议，劝告日方停止军事行动。中国仍希望通过外交努力，解决卢沟桥事变。

^① 参见肖桦：《1927—1937年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1995年2期《民国档案》杂志。

第三节 日本增兵，扩大战事

一、日军增兵平津

沈阳。7月8日清晨。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将领们兴奋异常，弹冠相庆。

关东军司令部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目前北方（指苏联）是安全的，所以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会议决定，“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一部做好立即出动的准备”。随时听令开赴华北参加作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东北，进犯热河，进攻长城各口，兵临平津城下，再犯绥远，攻城略地，关东军几乎都是打头阵，现在都认为该大显身手了。当日18时10分，关东军发表声明表示，对卢沟桥事件“保持极大的关心和坚定决心，严重注视着事件的发展”同时，关东军司令部派遣高级参谋田中隆吉和辻政信到华北驻屯军陈述强硬意见，支持其武装进攻行动，要求两军联名向日本国内提出意见。辻政信还跑到卢沟桥前线，煽动华北驻屯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得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立即向参谋本部报告，并表示：“已以第20师团的一部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强调扩大战争，以“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东京。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参谋本部开始制订向华北派兵的计划，准备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抽调一个师团，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到华北作战。当日深夜，陆相杉山元下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于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2年兵延期复员。同时，海军部也下令进入警备状态，以备对华紧急出兵。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已非常明朗。杉山元在给天皇的奏折中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了。”他们认为，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对中国的侵略：美国不大注意远东，英国受到德国的牵制，无暇东顾，苏联也不会干预日本的行动，卢沟桥事变“是千载一逢的良机，此时还是干为好”。

7月9日。第29军全歼日军一个中队，收复铁路桥和龙王庙后，卢沟桥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沉寂。日军畏惧29军驻平部队全线出击，佯作谈判以作缓兵之计。诡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

第29军方面当即表示同意。北平、天津两地中日双方代表进行谈判。

晨4时，北平方面代表秦德纯、张允荣和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和知鹰二、今井武夫等经过谈判达成三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除宛平城原有的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派来一部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第29军在取得收复铁路桥、龙王庙大胜之时，为什么还愿意与日方谈判，接受日方提出的屈辱的条件呢？

刘汝明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这时中央的指示是要应战不求战，我们开会的结果，是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决不放弃。所以便叫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接替宛平防务，抽出37师来集中兵力。132师急自河北各地向北平以南集中待命，第38师的刘振三旅和骑兵师的张德顺旅，固守廊坊，并阻断平津交通，不叫日人继续增兵”。

刘汝明事后的回忆和当时第29军的做法大相径庭，事实上中日双方的口头协议之后，第29军单方开始行动，秦德纯当即命令王冷斋和吉星文团长做好交接准备，他向二人解释说，这样解决是给日本人保留一点面子，找个台阶下。这时，有部下提醒秦德纯，近日丰台车站不断有援军到达，运输很紧张，不

像停战的样子。秦却认为：“日本军部的命令可能还没下达，我们去执行吧。”

9日凌晨，严宽将卢沟桥的情况向何应钦作了报告。他报告的内容可以说同冀察第29军方面是一致的，他称：“中日部队现已停止冲突。我方态度镇静与强硬，日鉴是况，因之情势稍转和缓。”“日方口气：不想事态扩大，但要求我方中日部队同时退开卢城。其企图有和中取巧，袭丰台故伎”。^①

但蒋介石比冀察当局者清醒，他向驻河南驻马店的第26路军孙连仲去电，令其“希即由平汉路方面派两师，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至车



第29军军长宋哲元

^① 《严宽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9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79-180页。

辆等事，径与经扶主任商洽可也”。同时令高桂滋第84师和庞炳勋第40军也向石家庄集中。

中午，北平秦德纯与日方达成三条协议的消息传到庐山，庐山方面对卢沟桥事变解决比较乐观。下午6时，俞飞鹏给重庆的何应钦报告了这一消息，“本日十时半起双方部队向永定河东西岸后撤，候谈判解决。现平方秦市长等态度颇强硬，津方由李公安局长等与日接洽，日方驻屯军及使馆，均有人向我接洽。窥其情形，似有牵（迁）就我方，不愿事态扩大之意”。^①

宋哲元给蒋介石的电报似乎更为乐观：“此间战争，今晨停息，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②

但事实是北平的现状并不是严宽向何应钦报告的那样，也并非宋哲元所说“告一段落”，更不是俞飞鹏报告的“牵（迁）就我方”。

7月9日清晨4时50分，第29军方面按照协议令石友三冀北保安队到宛平接防，行至大井村，便受到日军的阻击，死伤数人。日军重重阻挡，15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一天，至晚6时方抵达宛平城，但日军只允其携带步枪，每人只许带子弹30发，所带的机关枪则要运回北平。晚7时，保安队不足二百人进入宛平。第29军方面按照协议将宛平守军全部撤出，退守永定河西岸。

在百般阻挠保安队的同时，日军反而增加兵力，将机械化部队第2大队由通州调到丰台。下午3时40分，河边下令第2大队去宛平东北角的沙岗接防，企图利用吉星文团和冀北保安队换防的机会占领宛平城。

宛平城由装备低劣的保安队接防后，日军认为万事俱备，只待进城了，河边正三得意忘形地要求亲率幕僚“入城慰劳”，遭到中方人员的拒绝。日军两三百人仍留在沙岗一带未撤，士兵们忙着架设电话线，布置炮位，炮口对着宛平城。铁道旁、涵洞口都有日军盘查行人，弥漫着临战的气氛。

10日凌晨2时，进入宛平城的保安队接防甫定，饥肠辘辘，刚端上饭碗，日军突然向宛平开枪攻城，保安队放下饭碗操枪应战。

上午，冀察方面的秦德纯、冯治安、王冷斋、何基沣等，应日本人的提议，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笠井、斋藤一起召开联席会议，日方出席会议的4人中，没有一个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显然，日方以此拖延时间，无理纠

^① 《俞飞鹏致何应钦等密电（1937年7月9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64页。

^② 《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7月9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63页。

缠。会议中，日方代表被中方代表质问得理屈词穷，只得以离席到外面打电话为名，不辞而别，返回部队。

这时，增援北平的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山海关等处，携带着火炮、坦克等武器接踵而至。关外，尚有日军11列火车陆续隆隆开入关内，其中两列已进抵天津。下午3时，日军加强了在卢沟桥边的戒备，截断平卢公路，割断电线，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开始。

二、冀察当局的妥协退让

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看着每况愈下的局面心急如焚，为扭转不利局面，准备于当日夜间袭击丰台日军。经师长冯治安同意，决定乘敌人大部兵力尚未开到的时候，抓住战机，出敌不意，全歼丰台日军。此时，北平一带的兵力对比，中国方面暂占优势：原驻保定的陈春荣旅一团、东北军第53军万福麟部的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已开到长辛店，战斗力大为增强，全歼日军是有把握的。

何基沣部署停当，打电话向军部请示，此时第38师师长张自忠在军部坐镇，何旅长主动出击的要求遭到了张自忠的拒绝，他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蒋介石，他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仗。”

何基沣回答道：“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

一句话把张自忠驳得哑口无言，张感到何基沣意志坚决，不易说服，自己是第38师师长，不是何的直接长官，不好下命令制止。于是通过军部给何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严令。从此失去了出击的机会，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之中。第29军的将士眼睁睁地看着日军的援兵陆续到达。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为先祖父、父亲修筑坟墓。他闻讯对手下说：

“如果真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本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手榴弹，在喜峰口等地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飞机、坦克不如大刀顶用。今后局势不论怎么变化，我宋哲元绝不当汉奸，绝不卖国。”

7月11日，宋哲元从乐陵抵达天津。

蒋介石希望宋哲元立即到保定坐镇，指挥抵抗。他同时向北平、乐陵发了内容相同的电报，告诉宋哲元双方部队调动情况，并“希兄速回保定指挥

可也”。

宋哲元尚未意识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大举进攻中国的开端，他最大的担心是怕中央军北上，以抗日为名，渐次夺取他在平津的地盘。因此，希望通过谈判，以有限的让步同日方妥协，保住来之不易的军队和地盘。

12日，宋哲元发表对时局的谈话：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绝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则不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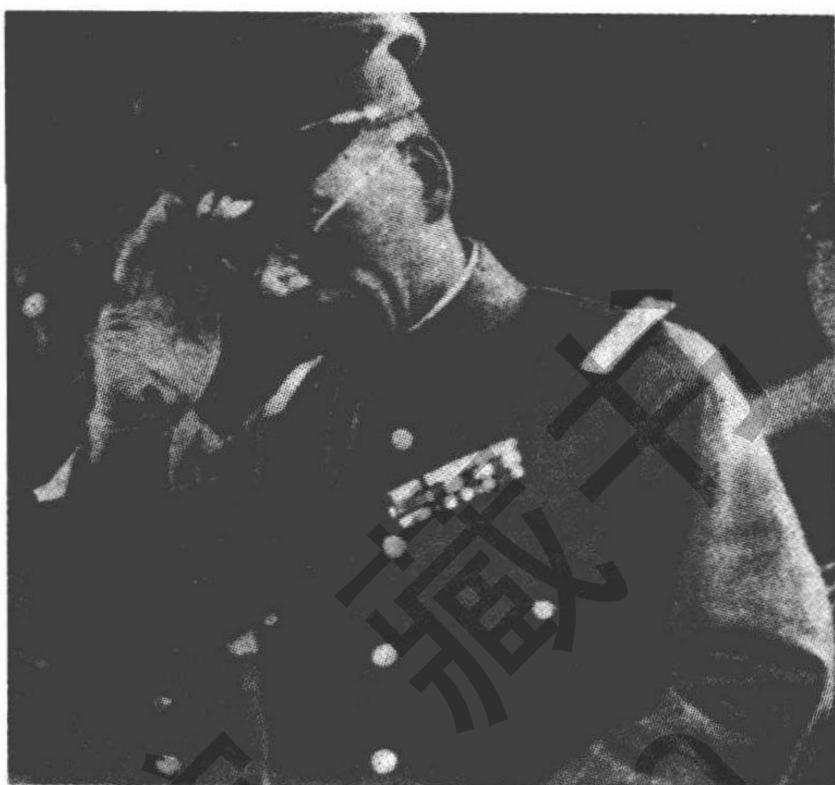
这时，秦德纯已获得日方大举增兵的可靠情报；何应钦也电话告诉宋哲元：“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定，坐镇主持。”

第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对宋哲元说：“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为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现按敌我形势，我占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前抓住战机击败敌人。”

宋哲元点头同意，并让张克侠拿出个采取主动的作战计划。张克侠当即制订了一个以攻为守的作战计划，将第29军兵力编成几个集团，分天津、北平、察哈尔三个战区，以保定地区作为总预备队的集结地区。首先消灭区内分散部署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然后全力向山海关前进，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在华北的约两万日军。但正当张克侠将作战计划交给宋哲元时，宋哲元上了日方的当，认为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亲自与天津的日华北驻屯军香月清司中将谈判。他后来对人声称：“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宋哲元回到北平后表示：“决本国家立场，国民地位，中央意旨处理，以期卢沟桥事件能早日解决，盖能平即能和。”

7月15日，日军制订了作战计划，报告给陆军中央部，计划如下：



日本华北驻屯军新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

其一，方针：

一、军在作战开始时，以突然行动进攻第29军，并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此为第一期。

二、在上述作战时，力求保护北平侨民。

三、第二期作战，根据情况，以现有兵力进出至保定、任丘之线，增加兵力后进至石家庄、德州一线，并准备与中央军进行决战。

其二，指导要领：

7月20日前兵团集中，并进行第一期作战准备。各部队展开地域为：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位于高丽营，一部位于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位于怀柔；第20师团位于天津、唐山、山海关地区。

其三，作战指导大纲：

一、第一期作战，主要在于一举击败北平西部的第37师，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根据情况一并攻击南苑之38师。在此期间，第20师团要随时准备击溃第132师。

二、航空兵主力，在战斗开始前集中轰炸好战的第37师所在之西苑、八宝山、北苑、长辛店等地，依情况亦可轰炸南苑。

在第一期作战期间，航空兵要集中力量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溃前来挑战的中国空军。

三、严禁轰炸北平市街及万寿山。

四、独立混成第11、第1旅团，由北平西北及以西地区向永定河一线进攻；对北平城不予攻击，根据情况派出适当兵力进行监视。

五、中国驻屯旅团主力，集结于丰台附近，按军部命令随时准备攻击八宝山的敌人，以策应第11、第1旅团的作战；配合攻击南苑与保卫丰台物资补给点。

六、第20师团主力，以铁路运输至北平以南地区参加北平郊外扫荡，应尽量在永定河南岸遮断第29军的退路，并以适当兵力做好击溃第132师的准备。

七、作战开始时，驻屯军以1个步兵大队为军预备队并警备天津；第20师团到达后，派出1个步兵联队作为军预备队。

八、有关事项：

第一期作战期间，为对付中央军北上，应随时切断平汉铁路。为使第29军无法利用铁路撤退，应将车头、车厢集中看管。独立混成第11旅团和第20师团，各派出一部兵力，分别在八达岭和津浦路方面进行警戒，以保障军的

侧背不受威胁，并为将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①

7月16日，东京五相会议，已决议动员侵华日军40万人，确定迅速灭亡整个中国的政策。大规模的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

蒋介石即已意识到日本的挑衅已非局部问题，是涉及全国性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宣布“最后关头”的讲话。他说：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所系。

第一，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或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国民党中央史委员会1981年印，第二编《作战经过》，第224页。

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总之，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讲话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抗日讲话，表明他决心领导全国进行抗战的决心。但他的抗日准备，尚未最后就绪，然日本已等不得他准备完全了，蒋介石发了十年的雪耻之誓，也到了一个该了断的时刻了。

在此之前，7月7日这天，应蒋介石的邀请，周恩来、林伯渠、博古等中共代表团前往庐山，周恩来到牯岭后，就国共合作抗战事宜与蒋介石展开谈判。经过多次的磋商，双方仍然存在着分歧。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加快了谈判的步伐。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继续谈判。蒋介石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在红军改编方面尚有分歧。

7月31日，南京政府下达了给共产党军队三个师的番号，并同意按中共所提人数及编制改编。

8月2日，蒋鼎文转蒋介石电报，邀请周恩来“约同朱毛诸先生即来京面商大计”。战争形势迅速发展，使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迅速建立起来。

^① 1937年7月20日《中央日报》第一版。

三、国民党的军事预案

蒋介石是个有心计的人。其实早在中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他的统帅部早已清楚中日间必有一场关系民族存亡的生死大战，并且早有预案。以下是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的《民国二十六年年度作战计划》（甲案）：^①

第一，敌情判断

甲、敌之企图及行动

（一）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

（二）敌军之攻击方向，为对黄河迤北，由古北口、山海关经北平到天津，沿平汉—津浦两路，向郑州—济南—徐州前进期将我主力军歼灭，或将我国军向西北贫瘠之区压迫，期以封锁之。其副作战，由多伦经张家口—绥远—河套—大同，及由北平经保定、石家庄，向太原前进，取包围山西之势。

此外更将利用其有绝对制海权，由胶州湾、海州等处登陆，以威胁我在黄河北岸作战军之侧背。

（三）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工业中心及首都所在地，敌今在上海已构成相当根据地，将以有力之部队，在本方面登陆，协同海军而进攻，期挫折我国抵抗之意志。

……

乙、敌之兵力及输送力

（一）陆军

（子）查敌国常备军有十七个师团及军属部队。战争初期，即可征编第一批预备兵十七个师团。战争开始后，又可征编第一〔二〕批预备兵十七师团。总计60余万人。此外当可征集预备及后备部队，除去警备后方在外，可以用于最前线之兵力约39师团17旅，约200万人。

（丑）只中日两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则日本为编成预备师，而实行总动员，非万不得已时，必不出此。故预计敌将酌留必要之兵力，以任警备。而对我使用之兵力，以12个至14个师团为最高额。若只局部发生战斗之时机，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23页。

则其使用兵力，或将不超过常备军之半数。

(寅) 由中日战争而惹起俄英美等之对日战，则苏俄平时常备军已有150余万，关东军亦有25万，预计苏俄即受欧洲方面牵制，亦可出兵50万以上。故敌军为对我先取攻势，最多只能使用30个至40个师团，即60万至80万之兵力。若在我国方面取守势，恐将自信其素质上之优越，而使用廿师团以下之兵力。

(卯) 敌国之输送其陆军经朝鲜至满洲者，每星期二至三师团并直属部队与其补给。经海道向我国任何海岸者，每十天约一梯团，计二至三师团连同一切附属品及补给。

(辰) 敌国在伪满及朝鲜驻屯军为六个师团。天津一带驻屯军有约一个加强师团。

伪满计26个步兵旅，骑兵六旅，独立骑兵六团。

故预计敌军如下：

北正面：驻伪满及天津三师团，在八至十日可由国内续送二至三师团，是以一星期后当有五至六个师，并伪满部队若干。

海正面：加入第一梯团二至三师团，须一星期。尔后续加同等兵力，为八至十日，是以十四日至十八日后，能有兵力五至六个师团，或分用于山东半岛—海州及长江下游地区，或合用于一处。

(二) 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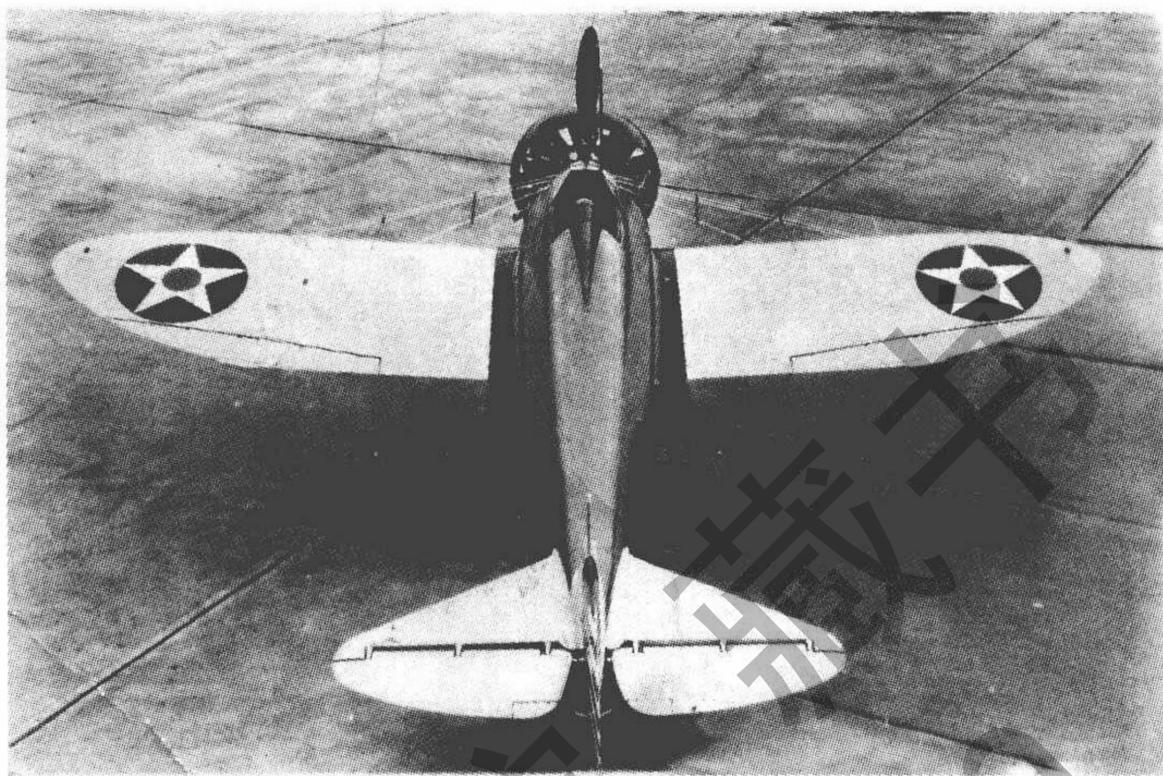
现敌驻我沿海及内河之第三舰队，为廿三艘、三万余吨。台湾马公要港所属舰队四艘、三千吨。以我海岸线之延长，海军兵力之薄弱，即敌不增加其主力舰，亦足以扰乱海疆而有余。故将利用其海军之优势，行动完全自由，仅以一部协同空军掩护陆军之登陆，余或集中于长江协同其陆军作战。或于开战初期，破坏我沿海要地，并袭用其不宣而战之故技，以阻碍我长江交通。



全面抗战爆发前正在训练的炮兵部队

(三) 空军

敌之空军合计属于陆、海两军者，殆不下飞机三千余架，民间飞机不与焉，故战时可扩充。然苏联在远东之实力已不下飞机五百架，美国空军亦有协助苏联袭三岛之可能，英在新加坡、中国香



抗战前夕的空军飞机

港之空军根据地，亦足以威胁敌国之西部，故敌之空军主力，将以自卫。其使用对我侵略者，或先以主力轰炸我重要城市及我空军根据地并主要交通线及铁路之要点，而以其一部协助其陆军之作战。

综合以上各种可能的行动，预计对敌作战之时机如下：

(甲) 敌国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或因局部军事行动，而揭开战争之序幕。如：

一、敌军为扩大冀东伪组织，实行侵占平津，而与冀察部队惹起武装冲突之时期。

二、敌军越过长城实行武力威胁我北方将领，而欲成立其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国之时期。

三、敌增兵淞沪，或以海空军袭击我首都，企图遂行其强迫谈判及威胁挟持等时期。

……

第二，敌情判决

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

第三，作战方针

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巨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迤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时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第四，作战指导要领

一、国军对待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

二、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

三、开战初期之状况，国军如不能进出沧保线时，则以主力使用于德州—束鹿—石家庄附近之线，仍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与敌行第一次之会战。

四、开战初期之状况，国军如不能进出德石线，则冀察绥部队，逐次占领预定阵地，行持久战，迟滞敌之前进，主力占领黄河下游—东阿—寿张—观城—内黄—安阳之既设阵地。左翼与山西侧面阵地相联系，实行攻势防御。

五、如第一次会战失利，则向预设阵地后退，并补充实力，准备随时转移攻势，歼灭侵入之敌军。

六、山东半岛方面，以一部于沿海岸直接阻止敌之登陆，主力保持机动，对已登陆之敌军，断行攻击。不得已时，应固守潍河之线，以掩护主力军之侧背。

七、海州方面，应直接阻止敌之登陆，对登陆成功之敌军，断然决行攻击而歼灭。不得已时，应逐次后退固守运河之线。

八、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灭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固首都。对杭州湾、江阴之江面，实行封锁，阻绝敌舰之侵入。

九、闽粤方面之国军，应直接阻止敌之上陆，不得已时，应固守龙岩—延平—广州之线，以确保我东南资源之地。

十、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

……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还有乙案，与上述甲案互为参照补充。都是抵抗日军的方案。这也说明蒋介石已经充分认识到中日双方之间将要发生你死我活的大战。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乙案）^①

（1937年1月）

第一，敌情判断

敌情判断如作战计划甲。

第二，敌情判决

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其主战场以华北为中心，并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绥路西进，及由山东半岛、海州等处登陆，截断我南北联络线，策应其主力军之作战，以囊括我华北全部，同时以一部由扬子江口及杭州湾上陆，以掠夺我资源，威胁我首都，并以台湾部队向闽粤沿海岸登陆，期助援其主力军作战进展容易。

敌若受国军压迫，必放弃以上之企图，最后则确保东三省之资源地。

第三，作战方针

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至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侵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绥远方面国军应积极行动，将敌操纵之伪匪扑灭之，向热河方面前进，以截断敌军后方〔联〕络线，俾我主力军作战进展容易。

第四，作战指导要领

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

二、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以达收复失地之目的。

三、敌军惯以华制华之手段，军民应精诚团结，敌忾同仇，须具必胜之信念。

四、应有专门机关指导义勇军，并组织民众，以游击战术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

五、作战期间，负有绥靖地方之国军，未列入战斗序列者编为预备军，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3-34页。

待命集中。

六、开战初期，陆、空、海军，应本此指导要领实施之。

其一，陆军

(甲) 晋绥方面

(一) 驻绥部队于开战初期，应迅速将商都一带伪匪歼灭之，如情况许可，即向多伦、赤峰、朝阳方向攻击前进，威胁敌之侧背。不得已时，应占领商都—六合—大清沟之线，掩护主力军之集中。

(二) 晋绥首脑部，平时对伪匪应有切实〔联〕络，启发其爱国思想，策划其扰乱敌之后方。

(乙) 冀察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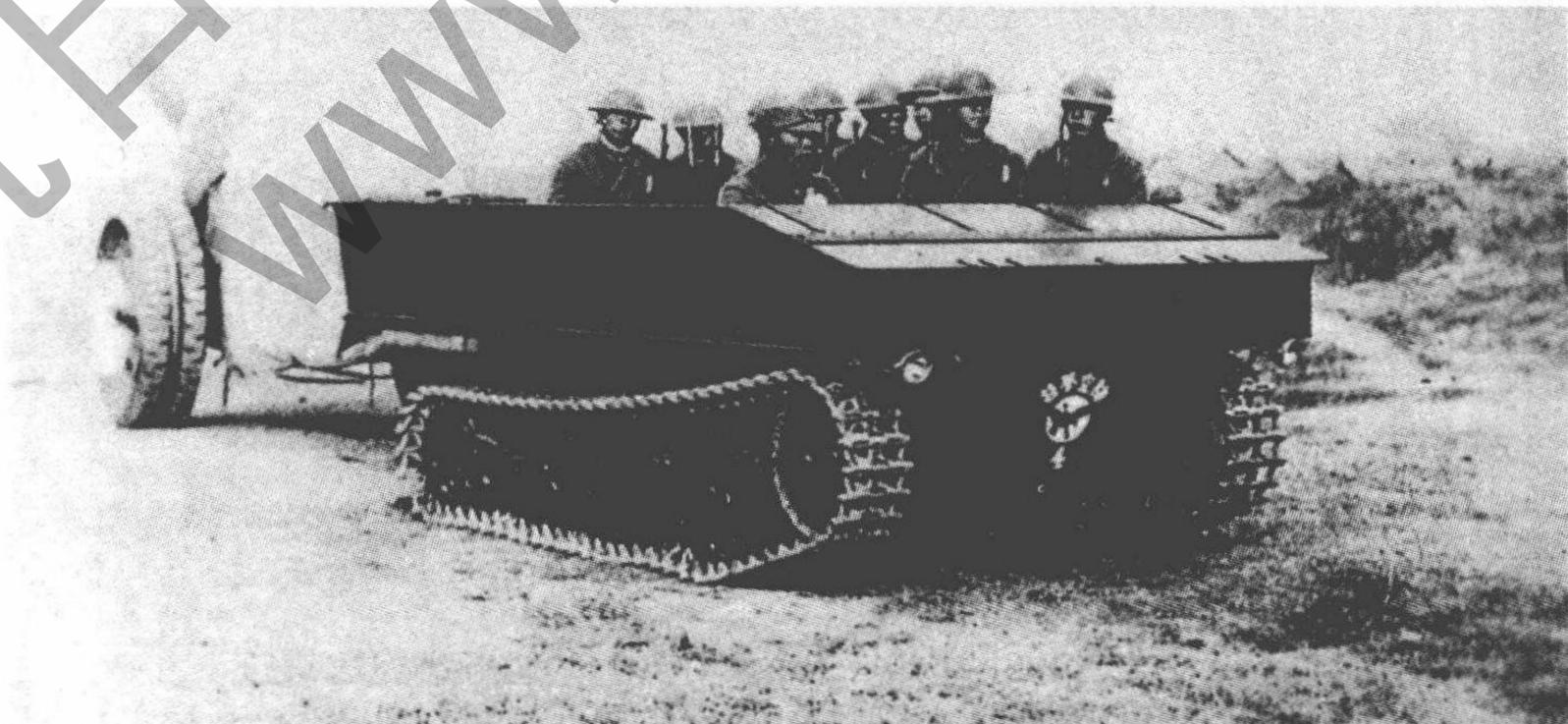
(一) 驻冀部队于开战初期，应将平津一带敌之驻屯军扑灭之，尔后以主力占领天津—大沽，一部占领香河—怀柔之线，掩护主力军之集中。情况万不得已时，天津—北平务必坚固占领之。

(二) 驻察部队于开战初期，应以主力搜荡独石口—赤城之敌，一部将张北之伪匪扑灭之，尔后则向承德攻击前进。不得已时，应占领张家口迤北沿长城亘独石口—赤城之线，掩护主力军集中。

(丙) 山东方面

(一) 开战初期，山东部队应将主力奇袭青岛，将敌之潜势力扫荡而扑灭之，尔后即将登陆诸设备及码头破坏之，并封锁海口，一部占领龙口—烟台—蓬莱—威海卫，情况不得已时，应占领白河之线，掩护主力军之集中。

(二) 青岛当轴应充实宪警力量，俾能协助国军扫荡敌军之潜势力。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从国外购买的装甲车

(丁) 江浙方面

(一) 国军于开战初期，奇袭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尔后则确实占领之。

(二) 上海应充实宪警之力量，俾能协助国军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

(三) 杭州湾—江阴江面务必封锁之。

(四) 海州—镇海—海门，务直接沿海岸破坏敌之登陆之企图。

(午 [戊]) 闽粤方面

(一) 驻闽部队于开战初期，应将福州—厦门敌之浪人及潜势力扫荡而扑灭之，尔后则直接沿海岸破坏敌之登陆企图。

(二) 驻粤部队于开战初期，应将汕头—广州敌之浪人及潜势力扫荡而扑灭之，尔后行直接沿海岸破坏敌之登陆企图。

其二，空军

空军于开战之初，以主力协同陆海军及要塞先将敌在我长江内之舰队扑灭之，并轰炸上海、汉口、天津、汕头、福州敌在我国占领之根据地。

(甲) 集中间

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国军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之作战。

(乙) 会战间

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之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资源地、海空军根据地，如东京、大阪、横滨及佐世保军港，并辽宁兵工厂、台湾，以获我空中行动之自由。

其三，海军

海军于开战初期，以全部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同陆、空军及要塞扫荡扑灭敌在我长江之舰队，尔后则封锁长江各要口并杭州湾、胶州湾、温州湾，拒止敌之登陆。

第五，战斗序列及战场区分

(略)

第六，集中

(甲) 集中配备 (如别纸附图)

(乙) 平时配置 (如别纸附图)

(丙) 集中输送 (如别册)

(丁) 最高统帅部

最高统帅部位置于洛阳或郑州，并组织需要，随时赴各地指挥。

第七，各兵团之任务及行动

(甲) 第一方面军 (山东区)

(一) 第一集团军

胶东方面：应以有力之一部于开战初期，迅速奇袭扫荡扑灭青岛敌之潜势力及根据地，尔后则确实占领青岛，阻止敌之登陆，以一部占领龙口—蓬莱—烟台—威海卫，阻止敌之登陆。

以主力集中于胶县—即墨—福山—潍县，随时能策应沿海岸部队，阻止挫折敌之登陆之企图。

(二) 第一预备军

集中于济南—泰安—德州之部队务须能随时策应胶东半岛及平津之作战。

(乙) 第二方面军（冀察区）

(一) 第二集团军

(子) 驻冀部队于开战初期，应迅速将敌之在平津一带之驻屯军扫荡扑灭之，尔后以主力占领天津—大沽，以一部占领香河—怀柔之线，掩护主力军之集中，尔后即向长城之线攻击前进，重点保持于左翼。

(丑) 驻察部队于开战初期，应迅速将张北—独石口—赤城之敌扫荡扑灭之，待第七集团军到达该线时，迅速向古北口攻击前进，威胁敌之后方〔联络线〕。

(二) 第四集团军

应以主力集中于良乡—固安一带地区，以一部集中于静海—别古庄一带地区，随时参加第二集团军攻击前进。

(三) 第五集团军

应集中河间—高阳—满城一带地区，随时参加第二集团军攻击前进。

(丙) 第三方面军（晋绥区）

(一) 第七集团军

驻绥部队于开战初期，应迅速将商都—德化一带伪匪搜荡扑灭之，并协助第二集团军将张北伪匪扑灭之，俟接收第二集团军占领之线，尔后向多伦—亦峰—承德之线攻击前进。

(二) 第六集团军

应集中于攀山保—阳原—大同一带，随时参加第七集团军攻击前进。

(三) 第二预备军

应集中于娘子关—太原一带地区，俾能随时策应第二、七、六各集团军之作战。

(丁) 第四方面军（江浙区）

(一) 第三集团军

应以一部于陈家港—连云港—青口—岚山头沿海岸直接阻止敌之上陆，

以主力集中于东海附近，俾能随时挫折敌之登陆企图。以一部集中于淮阴，俾能随时策应第一线之作战。左翼与第一集团军密切〔联〕络。

(二) 第八集团军

在开战初期，应以主力搜荡扑灭敌在上海之根据地吴淞—宝山并沿江海岸阻止挫折敌之登陆企图。

(三) 第九集团军

应以主力协助第八集团军搜荡扑灭敌在上海之根据地，尔后在杭州湾—镇海—温州湾沿海岸，直接阻止挫折敌之登陆企图。

右翼与第十集团军密切〔联〕络。

(四) 首都警卫军

应集中于南京—浦口—镇江—芜湖一带地区，于开战初期，迅速搜荡扑灭敌之潜势力及根据地，俾准备能策应沪杭一带之作战。

(五) 第三预备军

应集中于武进—长兴—宜兴一带地区，俾能随时策应第八、九两集团军之作战。

(戊) 第五方面军 (闽粤)

(一) 第十集团军

驻闽部队应于开战初期，将厦门—福州敌之浪人并根据地搜荡扑灭之，尔后则直接于沿海岸阻止敌之登陆，并将主力集结于南平—漳平一带地区，随时能策应沿海部队，阻止挫折敌之登陆企图。

右翼与第十一集团军密切〔联〕络。

(二) 第十一集团军

驻粤部队于开战初期，应迅速将汕头—广州敌之浪人并根据地搜荡而扑灭之，尔后则直接沿海岸拒止敌之登陆，并将主力集中于惠阳—广州—开平—阳春一带地区，随时能策应沿海岸部队，阻止挫折敌之登陆企图。

(己) 第一总预备军

应集中于西安—洛阳一带地区，俾随时能策应冀察区、晋绥区、山东区之作战。

(庚) 第二总预备军

应集中于南昌—武昌—汉口一带地区，俾随时能策应江浙区、闽粤区之作战。

(辛) 第三总预备军

应集中于徐州—开封—郑州—安阳一带地区，俾能随时策应山东区、冀察区、晋绥区之作战。

第八，航空与防空

(甲) 航空

开战初期：

(一) 第一集团军以南京—广德—杭州等地为根据，协同陆、海军及要塞，轰炸芜湖迤东（芜湖在内）长江下游之敌舰及上海敌之根据地而扑灭之。

(二) 第二集团军以南昌—孝感—武昌等地为根据，协同陆、海军及要塞，轰炸芜湖迤西以迄武汉长江江面之敌舰及汉口敌之根据地而扑灭之。

(三) 并以一部位置于济南—太原为根据地，轰炸青岛—平津一带敌之根据地，挫折敌之企图，迟滞敌之行动，并协助山东区、冀察区、晋绥区各部队作战进展容易。

(四) 应于（以）全部重轰炸队，以广德为根据，轰炸敌之资源地、海陆空军根据地，如东京、大阪、横须贺、佐世保军港、达（辽）宁兵工厂、台湾敌之空军根据地等，俾获得我空军空中行动之自由。

(五) 第一集团军之主力位于江南，一部移于徐州，对海州迤南之海面搜索敌之航空母舰、军舰及运送船而破坏之，并任首都之防空，并重要交通线之掩护。

(六) 第二集团军以主力位置于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任山东区、冀察区、晋绥区之军队输送集中，并搜索敌情，一部位置于南昌，任闽粤区之军队输送集中，并搜索敌情，并轰炸闽粤沿海岸敌之航空母舰、军舰及运送船。

在此时间对敌之空军务避免决战，务宜集结兵力对敌弱点乘机奇袭，以期将敌各个击破，逐渐消耗其实力；

会战时期：

(七) 第一集团军之一部，仍位于江南，搜索长江迤南沿海岸之敌舰船而轰炸扑灭之，并协同陆军之战斗。其主力移于徐州—济南—德州一带地区，对海州以迄胶州湾沿海岸搜索敌舰船轰炸而扑灭之，并协同陆军以击破敌登陆之企图。

(八) 第二集团军以主兵（力）进驻保定—张家口一带地区，协助第二、三方面军之作战。仍以一部位置于南昌协助闽粤军之作战。

(九) 空军则以主力协助华北主力军之作战，一部任各大都会之防空并沿海之搜索。

(十) 各期间兵力之转移，端赖地面设备及补给通行之周到，其详细计划，载于空军作战计划内，如附件所载。

(乙) 防空

(一) 各都市及军队并各交通路之防空载于防空计划内，如附件。

(二) 平时对民众应贯〔灌〕输防空知识，并训练其防空技能，其详细情形载于防空计划内。

第九，海军

海军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全部集中长江，协同陆空军扫荡扑灭敌在长江内之舰队，尔后任封锁长江口及各港湾，阻止敌舰之侵入。

第十，要塞

(甲) 要领

各要塞应严整战备，缜密计划，俾得随时应敌。在作战期间务击破出现我要塞前之敌舰船，并支援陆军之作战。

(乙) 海岸要塞

镇海—乍浦—海州各区要塞，各受各该方面军野战军之指挥，任务海岸之防守，协同陆、海、空军作战，摧破敌之登陆企图。

(丙) 江岸要塞

南通—福山—江阴—镇江—江宁各区要塞，各受该区野战军之指挥，于开战初期，出敌不意，与我陆、海、空军协力奇袭敌舰而扑灭之，尔后则封锁长江，阻止敌舰之侵入，并协同野战军之作战。

第十一，交通、通信

(甲) 交通

(一) 战时交通，务尽百般手段，尽量利用所有机关，而增大其输送能力。

(二) 铁道输送，由最高统帅部直辖而运用之，但状况必要时，得指定某段线路为方面军或集团军一时专用之。

(三) 海运及长江之水运，由最高统帅部直辖使用。各省境战区之内之河川，则归兵站管区或该方面军与集团军专用之。

(四) 各省境战区之内之公路，统归所属兵站管区或该方面军与集团军专用之。

(五) 关于船舶、汽车及铁道输送并各项输送器材等均须详细计划之。详细计划如附件。

(乙) 通信

(一) 最高统帅部与各方面军及各集团军间，应有直通之专用线一条，并利用国有电报与各铁道之路有电报线，而以无线电信为辅助通信。

(二) 最高统帅部与海军及空军间之联络，以无线电为主，国有电报线为副〔辅〕。

(三) 各方面军及各集团军与所属军（师）间，或各级司令部相互间之

连〔联〕络，以利用地方固有电报及电话线，并所属之野战电信队为主，以无线电副〔辅〕之。

(四) 关于通信详细情形及详细通信计划。

第十二，兵 站

(甲) 要领

(一) 兵站之设施，首应顾虑国军于黄河迤北及晋绥地区之作战不生障碍，并准备追随野战军进出热河向东三省前进为要。

(二) 对海正面之设施，应能随国军攻击运动，而使补给圆滑为要。

(三) 为顾虑国军长期作战计，对资源之征集应有周密之准备。

兵站详细计划如附件所载。

(乙) 集积主地及兵站线路

(一) 集积主地，设施于下列各地：南昌、汉口、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大同、太原。

(二) 主兵站线：

(子) 浙赣铁道，及沪杭甬铁道。(丑) 京沪铁道。(寅) 津浦铁道，及郑州迤东陇海铁道。(卯) 平汉铁道，及郑州迤西陇海铁道。

(辰) 同蒲—正太—平绥诸铁道。并尽量利用与上述各铁道线附近平行之诸公路及河川，而设置兵站线路。

(丙) 补给品之储存

(一) 储存野战军一百个师六个月需要之粮秣。

(二) 储存野战军以三次会战必需之弹药。

(三) 储存发动机必要之燃料及战时必需物品。

(四) 将上述各储存品，分置于各集积主地外，并就左列各地设置仓库：

宣城、蚌埠、归德、信阳、洛阳、太原、济南、南昌。

(五) 补给品之储藏，务宜分散，可就在集积主地及仓库地附近各处而配置之。

(丁) 卫生

(一) 作战初期，须准备兵站病院五十个及所要卫生材料六个月份，约可收容伤病者五万人。

(二) 编病院列车十二个，以担任病伤者之输送。

(三) 在太原、西安、南京、南昌、汉口等地，应筹设重伤病院。

(戊) 资源之征集

(一) 关于资源，平时宜统计调查统制使用之，俾为战时之利用。

(二) 兵器弹药之筹划，兵器可先购自外国，但弹药务必自给，仍须增强

自己兵工厂之制造力，设各海口被敌海军封锁时，应于广州、昆明、新疆等处，由外国购买，以为补充之来源。

第十三，警备

(甲) 铁路、公路、水路各交通之警备

(一) 铁路之警备，除各铁路原有之警备力量外，战时宜充实其力量。

(二) 公路、水路之警备，将民众训练健全组织之，俾负警备之责。

(乙) 地方之警备

(一) 陕甘宁青藏警备军：应绥靖地方，尔后则一部担任地方警备，主力应准备随时移调，以应援晋绥、冀察方面作战。

(二) 新疆警备军：应以一部担任地方警备，以主力由内蒙古向察哈尔集中，参加战斗。

(三) 川康警备军：应以一部警备地方，以主力集结于指定地点，俾随时参加各方面之战斗。

(四) 湘鄂赣皖警备军：应以一部警备地方，并任沿长江警备之责，并准备随时应援各方面之作战。

(五) 滇黔警备军：应以一部警备地方，以主力集中于指定地点，随时参加各方面之战斗。

(六) 广西警备军：应以一部警备地方，以主力集中于梧州随时协同闽粤方面之作战。

第十四，新兵器之补充

(一) 现时各师兵器甚为复杂，将来作战时，对弹药之补充，甚感困难，且因此减少战斗力，故宜将各师之兵器调整划一之，进一步，每方面军直辖各师之兵器，务必划一，俾战争力量充实。

(二) 每一方面军应有化学兵团，俾战时减少损害，并增加战斗力量。

(三) 我国海军〔岸〕线甚长，海军要塞均不能自卫，宜速筹设大口径列车炮，俾能防护沿海岸。

(四) 空军力量，宜速充实之，首先训练人才，其器材宜购买自造并重。

(五) 关于轻重机关枪、步兵炮、战车、装甲汽车、高射炮、重炮及化学兵器等，宜按财政力量，并以调整师之步骤，逐次充实之。^①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军事档案。

第四节 平津失陷

一、激战南苑及北平陷落

7月22日晚，参谋次长熊斌等秘密到达北平，与宋哲元会晤，熊向其通报了中央的抗战决心，使宋了解了蒋介石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同时，蒋介石命令军需署补充第29军子弹三百万发，并令河南一部分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指挥，对宋的抗日态度有一定的影响。

24日，宋哲元召集第29军将领商议了一个作战计划：决定以第132师一部守北平，其余的和第37师进攻丰台和通州之敌；第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第143师自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等地，截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

25日，北平、天津的日军业已部署到位，当然不会放过处在平津咽喉上的重镇廊坊。当日下午4时半左右，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的一个中队，乘列车行进廊坊站，以修理电话线为名，趁机占领车站，并抢占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在这种形势下，第38师主官还是命令部队“不能先敌开火”。廊坊守军不满其妥协的做法，先敌开火，打响了廊坊战斗。廊坊战斗由于作战部队士气高涨，使敌伤亡惨重。



为防御日军进攻，第29军在北平街头修筑工事。

战斗结束后，廊坊守军已和平津失去联系，第113旅既不了解平津两地的战况，也得不到师部和军部的指导，形成了独立与盲目作战的局面。26日，在日军飞机轰炸和重兵的围攻下，便主动撤出廊坊。撤退至安次的第113旅旅长刘振三觉得没有上级的命令而擅自撤出廊坊，怕事后不好交代，于是命令第226团团长崔振伦于27日晚夜袭廊坊。午夜，夜袭部队乘敌不备，发起猛攻。日军从睡梦中惊醒，仓皇应战。夜袭部队报国心切，熟悉地形，斗志旺盛，激战一小时，歼敌大部，小部逃入车站建筑物内。日军一列伤兵车上的伤员、保卫及医务人员全部被歼，廊坊车站被占领。正在这时旅部了解到平津形势险恶，便于拂晓前撤离廊坊。

日军占领廊坊，切断了平津之间的交通，切断了第29军军部与天津所属部队的联系，使第29军在军事上陷入了更加危急、被动的局面。

在廊坊战斗的同时，何基沣之第110旅炮兵一个营，乘敌不备，向丰台发起猛攻，战士们被压抑许久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喷发了，他们冒着日军的炮火勇猛冲杀，到中午已收复丰台大部，只有丰台东南一隅日军在拼死挣扎抵抗。

丰台胜利的消息传到北平市里，人们欣喜若狂，点燃鞭炮，像过节一样热闹。局部战斗上的胜利并不能扭转战略上的被动。丰台的胜利只是局部的反攻作战，既没有全局的策应计划，也没有其他部队的增援配合。攻击丰台部队经过10个小时的激战，疲惫不堪，也没有后续部队的增援。这时日军的增援部队由天津到丰台毫无阻挡，到下午4时，与丰台的日军相配合，一齐反攻，又占领了丰台。

这时的宋哲元见廊坊已失，丰台不保，形势危机，一面召见外交部特派员孙丹林，“告以战事恐不能免，外交大计仍应由中央主持”，一面要在平的刘汝明回察哈尔部署抗战。

26日上午，日参谋本部对驻屯军下达了对第29军“坚决予以讨伐”的命令。华北驻屯军派北平特务机关长对第29军下达了最后通牒。这样，经过近20天的战争酝酿，日军的大举进攻就要开始了。

是日下午2时，由天津增援丰台的华北驻屯军第2联队第2大队的500名日军赶到丰台，随即换乘26辆大卡车，径直开往北平，于晚7时开至广安门，他们佯称是日本使馆的卫队，从野外演习归来，企图闯入北平，守军第132师刘汝珍部关闭城门，不准进城，被阻日军摆开了攻城的架势。刘汝珍请示宋哲元，宋令刘汝珍备战。守城部队接令后将城门开启，诱敌入城。狂傲的日军认为中国军队又作妥协，便毫无顾忌地鱼贯入城。当日军半数入城后，守军官兵突然向车队猛烈开火，日军顿时混乱不堪，损失惨重。

当晚，宋哲元急电何应钦，报告广安门事件，同时报告“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所不免”。^①

至此，宋哲元才对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形势有所认识，并把外交大计交与中央，放弃与日军的交涉和妥协。

本日，日军向冀察当局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冯治安第37师于28日中午以前撤出北平地区。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持最后通牒去见宋哲元，宋令张维藩代见。张将通牒送交宋哲元过目，宋拍案大怒，愤愤地说：“我誓与北平城共存亡！”即命张维藩向松井表示拒绝，退还通牒，并立即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之通电。

日军在广安门受挫，使香月清司十分恼怒，便于27日中午下令平津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当日，通县、团河均告失守。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南苑乃至南苑至北平市里通路的各要点了。此时，宋哲元一切的调兵遣将和部署都属临阵磨枪和马后炮了，南苑的军队已成为日军刀俎之肉。

当时第29军军部已移驻北平城内，驻南苑的兵力有四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约七千余人。宋哲元命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官。

28日一大早，日军大举向北平南苑进攻。飞机轰炸，大炮轰击，步兵冲锋，气势汹汹。集结于团河附近的日军第20师团主力与华北驻屯军一部，在40架飞机的配合下，从西、南两面向南苑进攻，另以一部切断南苑至北平的



与日军作战受伤的营长金振中



在抗敌作战中殉国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

^①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6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95页。

公路。日本数十架飞机低空向守军轮番轰炸，日机沿着骑兵师营房的排列线疯狂地轰炸扫射，密集的马匹和士兵来不及疏散、隐蔽，一片接着一片倒在血泊中，堑壕内到处是人马尸体。部队受钳制不能活动。

佟麟阁决定到团河至北平间的大红门去掩护收容，他率领部队撤开公路循小径，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很快就到了大红门。佟麟阁令自己的卫队首先阻止部队毫无秩序的后撤并命令，不论哪个部队的士兵，现在都统一编组，凡是军官就出来指挥。将军是士兵的胆。溃乱的士兵看到副军长，顿时安定了情绪，并很快有组织地形成了临时部队。佟指挥临时部队掩护大部队撤退。下午1时许，当大部队收容撤退完毕之后，佟麟阁才和几个随从一起向北平城撤去。佟一行没有走多远，就和一股日军遭遇。日军利用青纱帐对佟突然射击，佟腿部负伤，部下劝其撤退裹伤，他坚定地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带伤坚持战斗。此时日军飞机对佟部投弹扫射，不幸击中头部，佟壮烈殉国。他身边的副官余某及卫士同时殉国。

从早晨到中午，日军片刻不停，给守军以极大的杀伤，通信器材被炸毁。激战至下午4时许，守军伤亡惨重，赵登禹除身边的一点战斗部队外，无兵可使，形同班排长。焦急中，才遇到由北平城里来的传令兵，赵向部队传达了宋哲元关于放弃南苑，各部队立即撤回城里的命令。由于没有事先的组织安排，无人指挥，无人掩护，各部队各自为战，纷纷后撤，秩序极为混乱。

赵登禹等随溃兵退入砦内时，大操场演武厅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向砦内外军队射击，守军全线溃退。

此时，赵登禹骑在马上，成为敌机追逐的目标，又是机枪扫射，又是投弹轰炸，赵师长被迫急跳下马，以一棵大树为掩护，掏出手枪向迎面俯冲而来的敌机“啪啪啪”地开火，突然前胸被机枪射中，血流如注，牺牲于阵地上。

佟麟阁、赵登禹的牺牲，是第29军的极大损失，在第29军内乃至全国引起巨大的震动。宋哲元得知噩耗，顿足大哭说：“断我左臂唉，此仇不共戴天！”

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表彰佟麟阁、赵登禹的抗日功绩，同时追赠二人为陆军上将。

在南苑坚持战斗的第29军军训团在突围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团一千多官兵光荣牺牲，突围而出的仅七百余人。

第38师驻南苑部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一直坚持战斗到晚8时，面对日军越来越小的包围圈，战士们毫不畏缩，顽强地进行还击，最后被迫退至一堵围墙下，全部壮烈牺牲。



在作战中牺牲的第132师师长赵登禹



第38师代师长李文田

驻守南苑的官兵，由于仓促应战，付出了惨重的牺牲，其壮烈场面十分罕见。几天之后人们在南苑战场上还看见“几百个士兵与马匹的尸体以及大量的军用物品，堆积在路上”，“路旁的壕沟及附近的田野中，也堆满了无数的伤兵”，“卡车上也满堆尸体，在炎热的气候下，这些尸体已在发臭。显然中国军队是被突然袭击，没有时间散开”。

二、天津作战及失陷

7月25日，日军侵占廊坊即切断了天津与北平的联系。

天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因而自卢沟桥事变开始后，日军就加紧攻击天津的各项准备。首先，日军占领了天津的海陆交通，日军驻塘沽的千余人占领了塘沽码头，同时又派兵占领了天津火车总站和东站。为方便运兵，又于7月26日修筑了从东站到东局子兵营十多公里的轻便铁路。其次，日军向天津大举增兵，除步炮兵外，又调来大批飞机，用于天津作战。同时还不分昼夜地举行实战演习，实行断绝交通的戒严。

当时日本在天津的驻军情况是：市中心海光寺驻有一个联队，有十几门炮，东局子飞机场停有30多架飞机，驻有一个中队负责守卫；总站和东站各驻有一个小队；大沽口外有日兵舰和海军陆战队。另外驻在平津和北宁线上的日军也可随时支援天津。

驻天津第29军第38师代师长李文田（师长张自忠在北平）越来越觉

得形势危急，预感大战迫在眉睫，是主动出击，还是就地固守，拿不定主意。便于7月27日召集第112旅旅长黄维纲、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天津保安队队长宁殿武和第38师手枪团团长祁光远等到静海县李公馆开会，筹划作战。此时，天津市及郊区部队及保安、警察部队共计5千余人，和日军相较，总兵力多于日军。

摆在各位长官面前的形势很清楚：对天津市内日军必须迅速消灭，否则援助日军一到，内外夹击，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立即主动出击，先机制敌，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会议推举李文田为临时总指挥，刘家鸾为副总指挥，于28日凌晨1时发动进攻。部队攻击的部署是：宁殿武指挥保安一中队攻东站；祁光远指挥手枪团全部和配属独立第26旅一个营及保安第3中队攻占海光寺日本兵营；李致远指挥独立第26旅和配属的保安第2中队攻占天津总站和东局子日本飞机场；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交通向导；黄维纲旅为总预备队。总指挥部设在西南哨门。

28日凌晨1时，驻津部队主动攻击日军的战斗打响了，日军仓促应战，进击部队最初的进攻很顺利。在东站，保安一中队将日军包围，激战两小时，日军被迫放弃车站退守在一个仓库中。保安队占领车站，奉总指挥部的命令，除留一个小队监视敌人外，余部支援攻打海光寺。在天津总站，独立第26旅朱春芳团在火炮的协同下，先克复天津总站，尔后又乘胜攻占了日军盘踞的北宁铁路总局。

进攻东局子飞机场的部队每人携带一小壶汽油和一盒火柴，飞速抵进机场，他们趁两辆汽车从机场内开出的机会冲进机场，打响了进攻战斗。进攻部队一冲进机场，日军的飞机即发动起飞，原来日军飞行员都睡在飞机里，听见枪声便迅速启动逃跑。进攻部奔向飞机，将汽油倒在飞机上，但由于汗水浸湿了火柴，怎么也划不着，战士们急红了眼，情急之下，有的抡起大刀砍，有的用刺刀捅，用枪打，用手榴弹炸，还有的撕破衣服，点着火引到别的飞机上。

一会儿，十多架飞机着火，机场上烟火冲天。机场守军躲进楼房工事里，起飞的飞机在天空乱飞，东局子机场的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天亮之后，进攻部队没有采取防卫措施，躲在敌房工事的敌人和飞机向暴露在机场的部队交叉射击，使我方部队损失很大。

进攻海光寺的手枪团和保安第3中队，在祁光远的指挥下，冒着日军猛烈的炮火，前赴后继，几经冲锋，到天快亮时冲至日兵营外围，并占领了东停车场，日军龟缩在兵营工事内射击，天亮之后，日军又出动飞机，向中国

军队扫射，进攻部队伤亡虽大，但也给敌人以杀伤。尤其是中国军队的突然进攻，打乱了日军的部署，使驻津日军特别被动。

大沽战斗是由日军进攻开始的。28日凌晨3时，锚泊在海河中的日本军舰和配置于海河堤岸的20多门大炮突然向大沽口开火，猛轰大沽炮台、造船厂和第38师第112旅第224团第2营的驻地。随后，敌登陆艇10余艘强渡海河，企图围攻大沽镇。

第2营官兵奋起还击，连续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并击伤敌舰多艘，破坏了日军的军用栈桥。

29日，李文田、刘家鸾等得知日军大举进攻南苑和冀东保安队反正是的消息后，随即发出通电，表示“……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

驻天津部队的抗战，得到天津人民的大力支持，工人、市民冒着酷暑，不顾生命危险运送弹药、运水、送饭。很多群众在战地流血负伤，甚至壮烈牺牲。

29日凌晨2时，日军分4路向天津市区进攻。第38师及天津保安队奋力抵抗，并对日租界实施包围，大举反攻。经过反复争夺，中国军队攻入日租界，从三方包围日军守备部队，日军把警官也推上前沿，甚至把侨民也组织成义勇军作困兽之斗。

早晨8时，大沽口的驻军也对停泊于海面的日本军舰进行轰击，日陆海军联合反扑，大沽口激战不休。



日军在天津市区开炮轰击



日军飞机掩护步兵进攻

在日军进攻天津市区的同时，保安队员一百多人进攻日军盘踞的公大第七厂，保安队兵分三路：第一路占据全厂的制高点发电机房和水塔；第二路攻占日本人的办公室；第三路到厂门口袭击厂内日军，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29日下午，保安队员一天没吃没喝，弹药将尽，依然斗志不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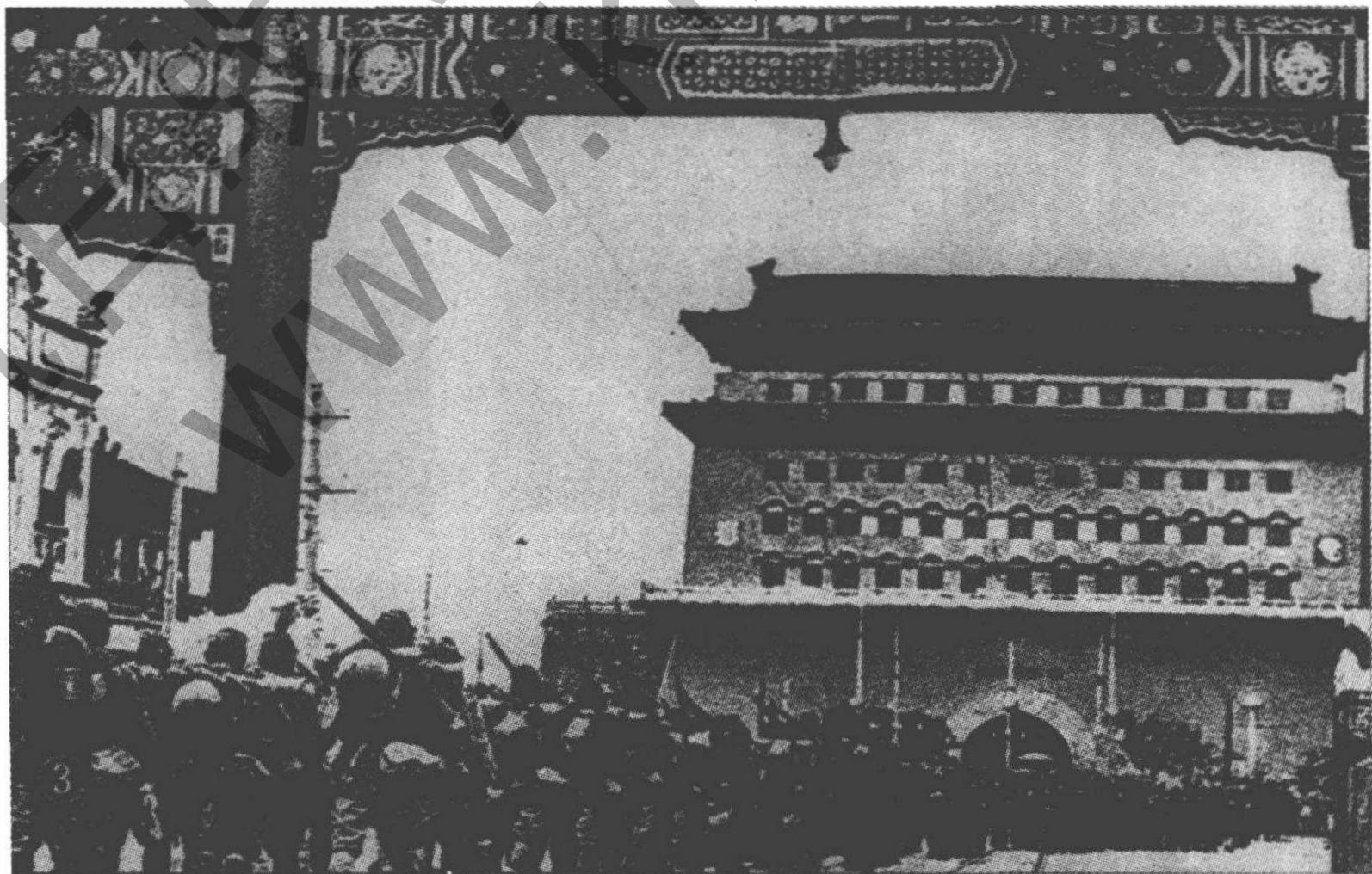
29日下午，日军第20师团高木支队迅速增援天津，关东军的增援部队也

由承德转径天津。当天下午，日军开始轰炸北宁路总站以北的保安队总部，北宁公园、市政府、金汤桥西畔的警察总部、电话局、东站和万国桥之间的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日本飞机对南开大学狂轰滥炸，随后，数百名日军乘汽车带煤油放火焚烧校园，使这所具有四十年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变成一片废墟。

北宁铁路总局大楼、天津市政府也变成一片瓦砾。但由于分散作战，且又被进攻日军分割包围，伤亡惨重。29日下午3时，李文田等人决定从天津市各点撤退，到静海县和马厂两地集中。但进攻的战士有的抱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宁死不撤，攻占公大七厂的保安队员不愿放弃已攻占的水塔，一直战斗到30日下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也就在这一天，华北的重镇——天津也沦陷了。

28日，南苑失守，损失惨重，北平四面告急，岌岌可危，随时都有陷入敌手的可能。宋哲元在中南海的指挥部中脸色铁青，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深知守土有责，不战而退，舆论和国法难容，但再战下去，准备不足，兵力分散，第29军支持不住。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领的牺牲，令宋自觉愧对战友；蒋介石等要其加强备战，防守北平，现在搞成折兵失地，又自忖违令，不好交代。他矛盾，焦急，乃至痛苦。但这时候如不采取措施，日军攻进北平，自己可能成为日军俘虏，处境进退维谷。

当天下午，宋哲元召集在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他向大家



侵入北平前门大街的日军

介绍了战况，现在既不能打，又无法谈和，请到会的各位提出对策，到会人员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正在这时，从南苑溃退入城的骑兵师长郑大章惊慌失措地闯进会场，惊慌地报告说，南苑官兵伤亡惨重，北平大有被围之虞。会议只得暂时变换内容，形势危急，时不我待。

宋哲元沉思良久，对大家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赴保定。”于是宋将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北平绥靖公署和北平市长等职务交与张自忠，于当晚率冯治安、秦德纯等出西直门，转赴保定。

宋哲元南撤之后，南苑战场上溃败的官兵陆续涌进北平城。北平人民知道他们打了败仗，但仍在马路边摆了馒头、西瓜、酸梅汤等食物，让战士们食用。有的市民脱帽向他们致敬。战士们自觉羞愧，对不起北平人民，头也抬不起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一带，集中着从南苑退下来的第29军的官兵，他们一个个情绪低落，神情沮丧，树荫花丛下，到处是丢弃的枪支、军服和破坏的汽车等，一片破败的景况。深夜12时，副参谋长张克侠集合部队讲话，命令大家于次日凌晨2时出发，撤离北平。

是日夜，宋哲元偕同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离开北平去保定，第29军驻平部队和保安部队相继撤出北平，经门头沟向南撤退。驻宛平至八宝山一线的何基沣旅掩护各部撤退完后，于30日夜撤出阵地，与当地默默无语的人民群众洒泪而别，退至长辛店。

北平、天津陷落。

但卢沟桥第29军官兵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华民族全民族的觉醒与全民族的抗战，功不可没。